

写诗的事情

在时间的加速度中忽然发现,自己的诗集可以标上四十年诗选了,《身体的雷霆》1985-2025,但其实,我写诗的时间比这还要早上几年,不过也有空置期,上世纪九十年代最长,有七八年没写任何诗,那时候工作落空,人生焦虑,在被动的狂飙突进中猛写小说,《一个人的战争》

《说吧,房间》《枕黄记》《万物花开》——我早就知道,写诗是不能换来稻米的。许多年之后才幡然醒悟,诗固然不能换米,但可以缓解焦虑呀,我居然把这忘了。轮到我跟同道中人说:高兴的时候,写一首诗就会更高兴,难过的时候,写成一首诗肯定会愉悦起来。对面的人应道:对呀对呀,就是这样。怪不得,虽然现在已被视为文学退潮不可回转,但写诗的人仍然是汪洋大海。

就这样——那些分行的句子/红瓦般叠起/一簇火焰一道涟漪/一句又一句//最后一个字落下/不需要句号/叮的一声/身体腾空而起

就这样,写诗成为内心的一个支撑物,它是一个锚点,有着结实的钢铁爪子,牢牢抓住你,免得向虚空中飘飞;也是风,引领向上,身轻如燕。

诗也是我放纵自己的理由。我不要那么严谨不要那么复杂,我不愿意雕琢与推敲,我对诗艺完全不放在心上,我需要第一时间把心中那些已经沿着我的胳膊冲到我手指的那些诗句赶快摺落在纸上。落到纸上我就放心了,我对着它们微笑,有些自我感动是正常的。我会开心一整天,以后再次看到也会再次高兴。

忽然想到,若无一间独立的房间,诗歌庶几可以代替啊。

几页纸,或者一个小本子,或者电脑、手机,你在那里建造起它的墙壁,那墙壁别人看不见你可以清晰看见,一砖一瓦一笔一画,一点点建造起来。可以盖得很大很高,可以一层再一层,建成一座宫殿也未尝不可。如此这般,我感到自己的心量也在增加。

然后我还是想要写得好一点,当我望向那些更高的山峰(那真是太多了),我梦见自己攀爬在那些嶙峋而坚硬的岩石上,艰苦而徒劳。同时我看到了另一座地貌全然不同的大山,那里森林茂密古树参天,在梦中我要寻找那里面的一只兔子……

即使在梦中,我也知道那是诗歌与小说的双重梦想。

暮年已至,梦想与写作都是给自己的一份礼物。“让我们跟着天、跟着地/跟着新生的兔子奔跑吧。”

忘了照相

任美康

澳洲二位,日本二位,两对满腹经纶的学者夫妇,于上海结伴,北上观光津门。是日,准点接到客人,步行去车站对面咫尺之遥的下榻处。宾主寒暄告一段落,即已抵达五星级酒店,酒店开门纳客仅数月,已是声名远播。步入大厅,走进房间,所见、所闻(含声音、气味)无不低调到合适,奢华到妥帖。凭窗东望,便见高铁南站及地铁3号线的站房,谦逊而帅气,将夕阳折射出灿灿霞光。

本埠二三好友,应邀前来,共助晚餐。点菜是个苦活儿,从不脱逃的我,当仁不让。手捧菜谱布阵,细心排列组合。最后说到啤酒,众皆谦虚,又都同意两人一瓶。我便心中有数,既有半瓶量,今日兴冲冲,不妨每人一瓶。见男女颌首应允,遂知每人两瓶无妨。啤酒终究是酒,下肚亦不含糊,搅动谈锋愈加雄健。于是,天南地北,天昏地暗。之后,纵情而归。

已回家,已洗漱,已上床,突接澳洲巾幗电话,上来就告知一个不幸:吾等



我从小喜欢趴在窗口往外看。

举起手枪瞄准麻雀,“啪”开一枪,是假的开一枪,“啪”得很轻,不过我的手枪是真正的手枪,就是用手假装的枪。

看见挑担子卖生煎馒头的来了,就说,生煎馒头来了!外祖母给我一毛钱,我下楼去买。生煎馒头装在纸袋里,我站在摊边吃,满手油,满嘴满口香。

爆米花的来了,我说爆米花来了,外祖母拿着米和年糕片去爆,我站得离开些,捂住耳朵等着那“轰”一声响。

光明牌棒冰来了,我去买赤豆棒冰,我总是说:“爷叔,我想要一根赤豆多一点的棒冰!”爷叔给我一根赤豆多一点的,但是他总是不笑,所以我每一次请求的时候,心里都有点害怕。

第一部电影也是在窗口看的,晚上,院子里放露天电影,风吹着幕布动,山会晃,爬山的侦察兵也晃,我下楼跑到幕布后面,摸摸变形的山和人,像摸到一个有趣的秘密。回到窗口继续看,一直看到敌人统统被消灭,幕布上出现“完”。小孩子看电影不喜欢“完”,好看的打仗电影更不要“完”,但是总会完。

我后来连续着爬山,当侦察兵,从一楼到三楼,贴着墙壁迂回前进,突然大喊一声:“不许动!”把外祖母吓一跳。

我也站在窗口看见过一次乌云密布。没有刮风,没有打雷,没有下雨,可是到了晚上听见大人们说,黄浦江对面的乡下刮过龙卷风了!房子被刮到天上去,卷到另一个地方落下来。这是第一次听见龙卷风,不是龙卷起风,是风像龙一样卷。

乌云密布在眼前,但是龙卷风不在眼前,我只看见乌云,没有看见龙卷风。

长大后看着窗外树上的麻雀、鸟儿,渐渐知道,以为看得清楚,其实都模模糊糊。

它们飞翔,停落,叽叽喳喳,飞去哪儿,又为什么

窗外很远

梅子涵

飞回,飞回的是飞走的那一只、那一群吗?发出的声音是叫喊、歌唱,还是在说麻雀话、鸟儿话?我“啪”地假装开枪,“啪”得很轻,它们怎么听得见,可是“啪”声未落,它们却都飞走了。

听见青蛙叫,知了叫,蟋蟀叫,却总是不知道究竟在哪儿叫,它们也有自己的窗口吗?站在自己的窗口唱歌,那么它们彼此看得清楚,听得出是愉快还是忧伤?属于美声还是通俗呢?

窗口看得见很多,看得见的很多里有更多的看不见。如果都能看见,那就没有真实的复杂和隐秘的丰富了,窗口和眼睛能看得清楚的只是卖生煎馒头的来了,卖棒冰的爷叔一次也不笑,却不知道他为什么不笑……

窗外很近,也很远。这不是不可知论,而是更真实的真实,更丰富的世界和人。窗口和眼睛,与外面的生命、世界,必定有很远的距离,这是一个永远的原理,不会枯黄,永远绿,可以称为绿原理。

门口路上的扫把工,来了又走,极速换人,甚至来不及记住他们的模样,更别提他们的来龙去脉。窗外的世界变得也飞快。

好几年里,对面阳台上有个男人坐着读书,不知道他读什么书,后来,还见到他出现,却再不见他读书,那把椅子依然在我只能很不肯定地想,他一定是把书全读完了,否则是什么呢?

那一对可爱的老人,每一天都手挽着走过,凑近说话,老太太略高些,老先生略矮些,老太太永远笑嘻嘻,神清气爽,身背挺直,老先生则像个幼儿,目光懵懂亦天真,认真看着老太太说话,每一句都像听到了一个新道理。

他们说些什么?什么新道理令老先生天真似

童。老先生是七十几年前中国最名牌的工业大学毕业的,老太太难道是他夕阳之下的苹果树吗?苹果纷纷从老太太的轻言慢语里落到他头上。的确看见老太太走着的时候摸摸老先生的头,老先生看着老太太,像儿童一样点点头,老太太是不是说:“你应该理发了?”

这都是看见和猜想,窗外很近也很远,真真真情都模糊。

由我住的上海,往北往南的两条经典铁路线,乘过无数次了,绿车厢,白车厢,红车厢,曾经慢得要命的,如今快得吓人,熟悉它的每一个车站,也以为熟悉它的田景、水景、城景,可是每一次坐在窗口,却依然认真看。是因为从来也没有完全看清楚,看明白呢,还是因为坐在窗口就是看的机会,眼睛是人的窗口……

视野的世界不是整个的世界,有信有感,有美有丑,似实似虚,似真似幻,似是而非。我不再会跑到幕后用很小的手摸摸它的晃动,世界和人生不是故事片,本在风里,也在灿烂日光和乌云之下,我们只能多些天真和善意,多些诗心和哲理,不必都窥破,令自己的目光柔和、明媚,总以笑容当句号,就算是一个真正的生命窗口人了,这其实也多难!

那一回对人说着自己从前的下乡路,说着那一篇我写的被老师们用来对学生讲学课业的《车票》,一个喜爱文学的校长说,她的乡下老家就在我下乡的公路边,《车票》里拖拉机“突突突”的声音她家都可能听得见!

她家的那个村子叫花角村,她小时候的贫困年月里,角角落落里也都种着花,不贵重,却鲜艳,充满生动的希望。她努力上学,到上海当了成功的校长。

她带我去那儿玩,见到了她满身文气的慈爱母亲,母亲在乡下也当老师。

母亲请了一位干净、



悠然·盛景 (油画) 陈韦辰

麻利的村民蒸糕给我吃,很多年前,我乘着长途车去农场的时候,她还只是一个小姑娘。她蒸的糕真好吃啊!她说,蒸糕是花角村很久的历史了!

这很久的历史、乡下的鲜艳和文气,哪是我坐在长途车的窗口看得见的呢?我可见的只是那个年月乡下最简单的房屋和暗淡灯光……

窗外很远。而此时,是不是有哪个窗口的人看见我正坐在

桌前写作呢?知道我写什么吗?或许只是看见,这个写作的人很认真,认真的神情有点儿帅。

窗外很近也很远。只有自己对自己是真的清晰:我在写《窗外很远》,我在温习生命的简易哲学。

自己对自己一定清晰吗?窗内其实也有很多的

不近。麻雀在窗外叫个不停,不知道它们是叫给谁听的,我听见了,很好听。

乙巳年的端午去给路秉杰先生送行,默默把一副手书的挽联填入灵柩,须臾便被堆叠的祭品埋没,这不过是替一副安详的躯壳料理最后的程序,而那曾经的有趣灵魂早已漫游在自在天国。

和路师的正式交集是在三十五年前同济文远楼阶梯教室内,仅有半学期的中国建筑史课。路师授课显然不屑用部颁教材

宣讲,而是按照毕生浸濡古建国学的悟识即兴发挥,都是课本里找不见的

神思妙想。他开宗明义讲自己名字中“傑”的古体是象形双鸟栖栖,会意优秀人才,但改作简体后就成了木头底下加柴烘烤,顿失斯文;由此引申到“建筑”今义来源于日文,1897年已有“日本建筑学会”,而中国1930年成立的还是“营造学社”。自此每讲古建构造,必从说文解字入手,“柱、梁、檩、枋、椽”在路师眼中便是“主一两一邻一方一传”的衍化,如同古乐五音之律。路师在讲台上手舞足蹈,用他浓重的山东腔鼻音抑扬顿挫念叨韵辞旧句,台下学子好像跟着说书先生手中挥动的折扇穿越古今,神游天下,这种课很难做笔记,勉强落笔的字画也不成系统,全凭心印,听懂了,终生受教,听不明白,此生无缘再会。

路师是陈从周先生1963年招入的第一位研究生,位列陈门弟子榜首,是陈先生几乎所有古建考察和新旧园林营造的追随者和协作者,堪当陈先生名下皇皇古建园林业绩的实操手,并将先生重要著作日译出版,功不可没。1980年路师以首批公派留学生身份负笈东瀛,从历史渊源上深掘中日建筑关联,用隔海遗存的古迹考证中土淹没不传的匠作制度。

告别同济十余载后,重逢路师于校园,双眸如电,印堂高亮,声若洪钟,原本稀疏的鬓发已褪成光头大

顶,大腹便便,姗姗踱步。路师后期致力浮屠研究,有“塔王”之誉,搞学问能做到和观照对象物我合一,庶几进入修身铸性境界。路师和陈先生俱出身寒微,依靠后天勤奋改变命运,但路师承袭陈先生乾嘉朴学重考据实证的治学风格,积累的浩瀚古建民居测绘图档和整理出版的古建文献大系,又岂是一个出身或名号所能媲迹,超然物外,不重外象而求内在。

为师之道重在投业解惑,但今世认知的更新如白驹过隙,为人师者被弟子超越指日可待,唯有师道尊严和治学精神可不朽,路师这派由学得道、以道解学的境界和处世,虽未必前无古人,但当下无来者。学生仰师高风,为“兹是哲匠”撰联“中州塔厦功在千古传承,东隅园庭自有四海流芳”。

那些曾被我们错过的、遗忘的时光,原来早已在银幕的微光里静静守候。

闺蜜甜派对

南妮

死角的完美机器人了。当然,那只是科学家做的梦。

6月20日下午三点半滕俊杰执导的8K全景声京剧电影《锁麟囊》,在大光明电影院放映。加场的票仍然快速被抢一空。我抢到的是第一排的两个座。散场时,遇到作家天谛,他得意地说,我是滕导给的票。然后他朝我投了很知音的一瞥,道:“你又要写了。”

晚上8点40分的法国电影《噬灵者》,是在静安嘉里中心的百美汇影城。从大光明电影院步行走到南京西路近陕西北路的嘉里中心,半小时。两个人一边热烈谈论着张火丁的神奇,一边沐浴在南京西路的晚霞中。这

十日谈

影迷的故事 责编:吴南瑶